老百姓是生养我的亲爹娘

采访李树建时，他还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。一位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豫剧流派创始人、省级院团的院长还依然活跃在舞台上，这样的艺术家十分难得。李树建说：“我这条小命是乡亲们给的，老百姓就是我的亲爹娘。我李树建没有别的本事，从学戏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学戏，学出点名堂，给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多唱戏、唱好戏、唱上一辈子戏！”为老百姓演出，这个诺言，李树建即便是在演出受重伤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。

青年报记者 郦亮

1 **我最初选择唱豫剧，就是为了能填饱肚子。**

生活周刊：您是如何走上豫剧艺术之路的？有人说您从小就喜欢唱戏。是因为家里的长辈喜欢戏曲吗？

李树建：其实唱豫剧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吃饱肚子。我出生在河南省汝州市的山沟里，父母生了6个子女，父亲又早逝，家里很困难。我经常要忍受饥饿。记得当时母亲规定我们每天晚上10点前务必睡着，否则过了晚上10点又饿了就再也睡不着了。

人一饥饿就会对食物特别敏感。当时县里也有豫剧团到我们的村子演出，我看到那些演职人员可以吃上白面馍，菜里面竟然还有几片肉！我当时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走出大山，去唱豫剧，这样就能吃上白面馍，还能找个城里的媳妇。

生活周刊：但是显然，您的从艺之路一开始并不很顺。

李树建：是的。在报考洛阳戏曲学校之前，我已经考过17个豫剧团，都没有考上。剧团的人都说我嗓子很好，但是功不行。剧团招人肯定是希望招进来马上就能上台演出，我又没正式学过豫剧，只会唱，不会做功，自然无法登台，人家是不要的。

转变是在1979年，那时我去报考了洛阳戏曲学校。当时我已经17岁了，家里仍然很困难。去洛阳，没有钱坐车，沿着铁路线走到了洛阳。回家的路上，又累又饿，走不动了，趴在路边两眼发黑，眼看着就不行了。幸亏碰到一个好心的赶马车的大叔，把我捎回来，还给我买了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这碗面条叫我终生难忘。回到家，尚未接到录取通知，我又出发去其他地方报考，当时父亲病重，母亲把粮食卖了，换了10元钱给我当路费。不过好在第二年的春天我收到了洛阳戏曲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

生活周刊：学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

李树建：考试的时候老师们对我印象很好。觉得我嗓音条件不错。我唱完后，老师们还鼓掌，还有老师把我的演唱录下来，说是要给领导听一听，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好苗子。当时有很多人报考，但是学校只招变了声的男孩子。我已经完成了变声，所以这方面也占了一些优势。

但是岁数大也有岁数大的劣势。之前不是说我有嗓子，没有功吗？练功成为我要在学校里着重学习的，但因为年龄比较大，身体不像小孩子那么软，比较硬，练功尤其辛苦。做一个动作，我必须用别人3倍的力气去练，疼得受不了。不过我还是坚持下来了。在戏校学戏的那5年，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。2001年我在一次演出中从2米的舞台上摔下来，受了很重的伤，到现在我的左肩膀里还打着钢板，但我坚持活跃在舞台上，为观众服务。

生活周刊：从戏校毕业，正式成为一名豫剧须生演员，那时豫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？

李树建：我是1984年从洛阳戏曲学校毕业的，读了5年，被分配到洛阳豫剧团。几年之后我又去了三门峡市豫剧团。当时豫剧市场十分火爆。男女老少都需要看豫剧。记得我在洛阳豫剧团时，工资40多元，但是演出很多，补贴也很多，1个月能拿到100多元。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感觉有点变化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。过去人们的娱乐方式比较单一，看戏是主要的娱乐方式。后来电视普及了，各种娱乐形式也都兴起了，剧场里慢慢发生了变化。豫剧和其他剧种所经历的那些凄惨局面有所不同，河南省就有1亿多人，豫剧戏迷基础很大，即便分流一部分，也依然有很多人。所以豫剧并不存在没有观众的情况。变化的是，观众老龄化比较严重。我们当时用“三多三少”来形容豫剧的状况——老年观众多，青年观众少；农村演出多，城市演出少；包场的多，卖票的少。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

2 **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，我们根本坚持不下来。所以，我每年都要抽出时间下乡演出，一定要对得起观众。**

生活周刊：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，您1998年赴省会郑州竞聘河南豫剧一团团长，其实也是怀着改变豫剧面貌的雄心？当然，奔赴郑州，现在来看，也是您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
李树建：可以这么说。我在三门峡市豫剧团后来担任了团长。但是那毕竟是一个地级市的剧团，和省团的平台是不能比的。1997年全省公开招聘河南省豫剧一团的团长，我就去了，结果在竞选中，我的演讲、答辩、考试、考核四项成绩均为第一，1998年3月调入豫剧一团当团长。

到了豫园一团后我就进行了改革。我认为豫剧还是要争取观众，而观众基本上都在基层，所以我就带着演员们扛着行李去基层演出。那时社会上有两种人出门带行李，一个是农民工进城，一个是演员下乡。下乡演出时，好一点的睡过土炕、课桌，有的地方连土炕、课桌都没有，羊圈、牛圈都住过，有时干脆在地上铺点麦秸打地铺，夏天蚊虫叮咬，冬天寒风刺骨。

“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我们坚持每年演出300场以上，80%的演出是在矿井下、敬老院、贫困山区，再艰苦的地方都回响着我们的梆子腔，山羊能上的地方都有我们演员的身影。

生活周刊：老百姓在您心中的份量好像特别重。

李树建：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小时候是村里东家一口奶，西家一口饭，把我养到大。在成长道路上，又得到了很多群众的支持。我这条小命是乡亲们给的，老百姓就是我的亲爹娘！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，活命之恩，我又何以为报？我李树建没有别的本事，从学戏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学戏，学出点名堂，给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多唱戏、唱好戏、唱上一辈子戏！

最困难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，我们根本坚持不下来。所以，不管多忙多累，我每年都要抽出时间下乡演出，记不清多少次带病坚持为父老乡亲演出。每回去农村演出时，老百姓都背着凳子、光着膀子争相去看，大家都说，‘李树建才是咱老百姓的艺术家’，我深深感受到他们对好戏的渴望，所以现在再去演出分外用力，一定要对得起观众。

生活周刊：说说常香玉大师吧，您担任团长的省豫剧一团也正是常香玉所在的团，听说她对您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。

李树建：常香玉大师在我心里是十分崇高的，那是大艺术家。我调到省豫剧一团后，与常香玉大师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。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刻。一件事是我一次在郑州演《清风亭上》，常老师悄悄地来看了，我在台上演，一点都没有看到她。后来她就把我叫到她的家里去，和我谈她看了戏后的感觉，给我了很多指导和建议。常老师对我的艺术成长还是很关心的，这让我十分感动。

还有一件事是2003年，当时我已经在省豫剧二团当团长，我们全团去给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建设者们慰问演出。当时常老师身体已经很不好，正在北京住院，我打电话给她，希望她能和建筑工人们见见面，她一口答应。常老师来了，不仅去了建设工地，还一直坚持到晚上演出的政协礼堂。她在台上说，她已经唱不动了，可以让学生们唱，她来就是想和观众们见见面，说几句话。此情此景令很多人动容。

此后常老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这应该也是她最后一次出来和观众见面。也就在病重的时候，常老师还一直关心豫剧的发展。有一次我去医院看她，她问我：“豫剧还中不中啊？”我说：“中！”当时我们排了一系列新编豫剧，获得了观众的肯定，这也让常老师很欣慰。2013年河南省豫剧院恢复设立，我担任了院长。河南省豫剧院创立于1956年，常老师是第一任院长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豫剧院解散了，直到2013年恢复，所以我是第二任院长。我有时在想，豫剧近年发展得不错，我应该没有让老院长失望。